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 三维批判及当代价值

聂志红

【内容提要】 政治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而兴起的一门学科，起始便具有特定的资产阶级立场。在理论演进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逐步形成了效用价值论、“三位一体”分配论、供需决定价格论等基本观点，发展出一套以假设-演绎法为基础的分析方法。马克思恩格斯从立场、观点与方法三个维度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全面批判，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鲜明的斗争特征，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科学指南。

【关键词】 阶级立场 效用价值论 假设演绎法

作者简介： 聂志红（1973-），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习近平指出，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①。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立场、观点和方法三个维度出发，对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全面剖析与深刻批判，科学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斗争与批判，有利于更好地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核精髓，提高鉴别能力；有利于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坚持守正创新，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特定阶级的立场：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属性

17世纪以来，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封建行会制度加速瓦解，工场手工业成为主要生产方式，新兴资产阶级势力逐渐形成，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解决实践问题的社会科学适应现实需要而产生。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来考察社会分工，把社会分工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②早期的重商主义学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最初的考察。17世纪中后期及18世纪，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相继爆发，资产阶级开始掌握国家政权，资本主义制度全面确立，政治经济学体系随之形成。马克思系统评析了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科学地划分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他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

① 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求是》2021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2页。

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①。其后进入庸俗政治经济学时代。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全面剖析和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立场。重商主义学说，代表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商业资产阶级利益，认为金银财富来自流通领域，主张国家干预以保证金银财富的流入，属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史。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为亚当·斯密，代表着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利益，他批判了封建主义经济制度，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和限制国家干预。庸俗政治经济学包括以李斯特、马尔萨斯、萨伊等为代表的多个流派，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他们放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传统，只研究经济现象的外在联系，否认阶级利益对立，致力于为资本家剥削工人提供辩护。无论是早期的政治经济学，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抑或其后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不同流派，其首要和共同的特点就是其资产阶级属性，都是资产阶级利益诉求的集中反映，不同之处仅在于其分别代表处于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或不同产业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一国的经济政策会从根本上影响各阶级的利益分配，阶级的对立关系总是在物质利益而非经济理论的冲突中才以最不加掩饰的形式表现出来，政治经济学的阶级立场在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之争、《谷物法》存废之争就是两场最能体现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立场的争论。

自由贸易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主张，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则反对自由贸易。李斯特认为，自由贸易的前提是全世界各国结成一个有和平保证的联盟，但这只能是假设，而非事实。在世界各国发展极不均衡的条件下，如果经济落后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先进的工业国就会利用强大的工商力量和军事力量压制经济落后国，二者不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李斯特指责斯密的经济学是只注重交换价值而不考虑“生产力”的“死板的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叙述了自己以“生产力”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学，主张当时的德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对李斯特的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马克思认为，李斯特的全部学说只不过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想使竞争规律、交换价值规律、买卖的规律在他的国门之外丧失自己的力量”^②的目的。李斯特主张保护关税的真正目的，是使德国的资产阶级免于同先进国的工业品竞争，更顺利地在国内进行剥削，他对于“生产力”的关注是“一种无耻的伪善和唯心主义的粉饰（欺诈）”^③，不过是企图在道义上证明他比只关注交换价值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更加高尚。李斯特并没有真正驳倒斯密的理论，还进行了故意歪曲。恩格斯指出：“贸易自由必定一方面造成垄断的恢复，另一方面造成私有制的消灭。”^④德国在经济发展阶段上落后于英国，李斯特只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出现，他的理论无非是资产阶级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之争本质上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落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自由贸易论者和保护关税论者分别充当了各自国家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即便是李斯特本人也斥责德国的自由贸易主张者的后盾是“英国势力”，指责英国政府通过“机密费”等手段操纵舆论，认为“只要有有助于它（英国——作者注）的商业利益，它是从来不惜任何代价的”^⑤，他的发现恰恰佐证了政治经济学鲜明的资产阶级立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⑤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页。

《谷物法》存废之争主要在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之间展开。李嘉图坚决反对《谷物法》，认为它会使谷物价格上涨，而必需品价格的上涨意味着工人名义工资的提高，工资的提高必然导致资本家利润随之减少^①；马尔萨斯则认为，谷物价格上涨将促进农业部门的生产，增进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不从事生产的土地所有者的需求才是社会真正的有效需求，这种需求的增加将促进整个社会的繁荣。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分歧在于究竟是工业资产阶级还是地主阶级的得益更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二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同劳动者阶级完全对立起来。在劳动者同产业资本家的对立之间，李嘉图站在产业资本家一方，而在产业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的对立之间，马尔萨斯站在土地所有者一方，劳动者的利益被完全抛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都将工人阶级的贫困看作是自然的、合理的，不同之处在于李嘉图将低工资率看作维持利润的必要条件，其观点就是“‘要使工人勤勉地劳动’，必须尽可能地把工人的工资减到最低限度”^②；马尔萨斯则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过剩人口解释为自然规律，并把刺激资本主义生产的希望寄托在地主阶级的消费上。在面对无产阶级时，二者都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即资产阶级一方。重商主义关于压低工人工资才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的看法，被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全盘地、自然地继承下来。

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阶级立场的认识深刻而敏锐。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必然带有某种特定的阶级立场，但立场本身并非评价理论是否科学的唯一标准。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因斯密、李嘉图等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而全盘否定他们的学说，反而还高度赞扬他们在经济学说史上的重要贡献。同样，他们严厉批判了李斯特和马尔萨斯的学说，也并非只是由于二者的阶级立场。马克思批判李斯特是因为李斯特为了证明其保护关税观点的正确性而刻意歪曲了斯密、李嘉图的学说，还不惜向德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妥协，请求他们保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李斯特那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让位于特殊阶级的利益诉求。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批判更加严厉，因为马尔萨斯实质上已站在了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对立面。马克思认为，李嘉图“为生产而生产”的要求，从他所处的时代看来有着天然的合理性，因为李嘉图本质上要求的是生产力的进步，他持有资产阶级立场是由于资产阶级在当时确实承担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使命，不能因为李嘉图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就指责他的学说缺乏科学性。马尔萨斯则一贯地反对无产阶级，将工人的贫困归咎于人口生育的自然规律，并为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地主阶级极力辩护。一旦产业资本家的利益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相冲突，马尔萨斯就反对产业资本家以维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马尔萨斯完全站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对立面，成为“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③。

除了李斯特、马尔萨斯之外，庸俗政治经济学还存在两个主要流派：一派以巴师夏、西尼尔等人为首，他们强调“经济和谐论”，企图证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提供辩护；另一派以约翰·穆勒为首，提出了折中主义，即在一定限度内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弊端，主张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温和的社会改良。为了在劳动者和资本家冲突加剧的情况下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着力攻击主张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学说，“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④。庸俗政治经济学彻底背离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

① 参见〔英〕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8-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的初衷，剥离了政治经济学原本所具有的科学性，滑向彻底的庸俗化，将政治经济学作为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意识形态工具，将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内化于社会正义的要求之中。“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①在庸俗政治经济学家那里，特定的阶级立场完全掩盖了科学研究，理论沦为立场的附庸，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出版的，对庸俗经济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在资产阶级处于革命上升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进行客观的探讨，含有一定的科学成分，因为它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当资产阶级巩固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不可调和，继起的庸俗政治经济学以所谓的纯学术、价值中立为标榜，掩盖自己的资产阶级属性，不顾客观事实一味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阶级立场的剖析说明，必须认清理论背后的阶级属性，不能把政治经济学当成“价值中立”的“纯科学”，要认识到一种经济学理论到底是从哪个阶级的立场出发，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

二、囿于表象的观点：效用价值论、“三位一体”分配论及供需决定价格论

在马克思的时代，政治经济学领域存在不同的价值理论。马克思合理继承了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传统，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原理。劳动二重性原理是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作出的根本性改造，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②。斯密最早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劳动价值论的内容，开创了劳动价值论传统，这是斯密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重要贡献。但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存在诸多认识上的模糊：第一，由于对劳动和劳动力不加区分，斯密不理解劳动能力本身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无法解释为何在简单商品交换中完全成立的价值规律在雇佣劳动的场合却失效了。第二，虽然斯密能够指出剩余价值本质来源于工人的无酬劳动，而非来自商品在流通中的加价，却无法说明利润的存在与等价交换原则之间的矛盾。第三，混淆了剩余价值、地租和利润，斯密不加区分地将利润和地租看作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没有从特殊形式的方面来考察。他发觉在预付资本不同的情况下，即便工人提供同质的无酬劳动，剩余价值或利润的量也会不同，这一现象与他对利润的定义出现了矛盾：既然利润无非是工人提供的无酬劳动，那么利润的量为何会因为预付资本的不同而发生改变？马克思指出，“古典经济学对特殊形式的研究非常混乱，它总是把特殊形式和一般形式混淆起来”^③，点明了斯密产生这一矛盾的根源，事实上，只要把这一矛盾放置于社会生产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中就能得到合理解释。斯密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观察是全面且深入的，但他将一般形式与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以至受困于现实商品交换过程同价值规律现象上的矛盾，也使他对于价值的定义总是在耗费劳动论和购得劳动论之间摇摆不定。

与劳动价值论同时存在的，是庸俗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效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商品的有用性即效用，而效用只能由商品的买者在心理上给予主观的评价，因此价值不由客观的尺度决定。效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边沁认为，“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④。功利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人们行为的动机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

④ [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8页。

是获取最大的幸福，任何行为的结果均可用效用来衡量，判断行为对错的标准是总效用的增减，使总效用增进的行为是合理和可行的，反之则不合理和不可行。边沁的“效用”含义比最初的效用价值论的效用含义更加广泛，它不再单纯指商品具体的使用价值，而是泛指快乐和痛苦的量，商品的使用价值属于这种效用的一部分。

马克思并未完全否认“效用”概念，效用本身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现象，人在进行决策时，当然会考虑行为给自身带来的结果，把对结果的理性算计称为效用并无不妥。效用原则的错误不在于概念自身，而在于效用原则本身所隐含的非历史性。在马克思看来，边沁只是从现存社会的表象出发抽象出了一套人性原则，这种原则仅仅属于当下的社会形态，而不能用于历史的考察。马克思指出边沁的所谓效用原则的内容只是表象，不可能从这种效用出发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效用原则的缺陷：“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要用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行为，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①。边沁的错误在于，他并没有考察人的本性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只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性当成一般的人性，并以这种人性为标准来判断事物的有用与否。此外，效用原则的一般性不能用于解释资本主义生产。边沁将效用原则描绘为一种一般性理论，但一般性理论恰恰不能用于理解特殊的社会形态。要理解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就必须考察它之于从前一切时代的特殊性即生产关系的变革。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将财产用于奢靡消费而不适用于积累，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则崇尚“节欲论”，将财产用于资本积累和扩大生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于“效用”的追求有完全不同的表现，不能以效用代替价值。要解释生产方式的变迁，只能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效用原则对此无能为力。

在分配理论方面，马克思严厉地批判了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萨伊的分配理论同效用价值论紧密关联，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就是商品的效用，而价值由劳动、资本和土地创造，在分配中就相对应地产生了工资、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和地租的范畴。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土地和劳动三者“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彼此之间毫无相同之处”^②。这个公式中的资本是属于一定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土地是无机的自然界，而劳动则只是一个不具有任何历史性规定的抽象，只代表人类的一般生产活动。在现实的历史中，“劳动”并不总能参加分配。在奴隶社会，进行劳动的是奴隶，但奴隶在分配中却一无所获，所有劳动成果都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的“劳动”并不意味着奴隶能够获得相应的“工资”。在封建社会，拥有土地的农民常常被封建统治者征收高额税收，有时甚至得不到任何劳动成果，农民并未凭借土地在分配中得到地租。还有，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资本”这个范畴还不存在。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才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土地所有者才能以土地私有权的形式取得地租，资本才能凭借所有权取得利息和利润，这种分配方式由特殊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人类社会最初的生产可能取决于某些自然的前提，但是，一旦经过生产过程，自然的前提就会变为历史的前提，“并且对于这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③。因此，是生产决定分配，而不是分配决定生产。“三位一体”公式只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分配现象，但被萨伊反过来用于解释价值生产，并企图将这种对应现象合理化，无疑是荒谬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由效用价值理论自然导向供需决定价格理论。既然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买者的主观评价，那么价格就不依赖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客观劳动量，而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相对状况。马克思对供需决定价格理论的批判与他对于效用原则的批判相似，他并不否认供求规律的存在，但他认为供给和需求只是表象，“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①。从供给和需求出发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是在用现象解释现象，无法触及本质。在经济学说发展史上，无论东西方早就都有关于供求关系的论述，供求关系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独有现象，也很难说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见。只不过在商品交换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生存高度依赖市场交易，供求规律才得以被反复提及。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供求一致只是偶然现象，“这种一致只是作为过去的变动的平均，并且只是作为它们的矛盾的不断运动的结果”^②，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矛盾恰恰是要不断地破坏这种均衡。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攫取利润，这种动机会促使个别资本家不断推进技术进步，以使个别资本生产某种商品所需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获得超额利润。技术一经改良，又会在不同部门之间扩散，从而改变部门的利润率，使资本在各部门之间重新配置，最终形成新的一般利润率。如果把价格看作由供需均衡决定的，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市场价值正好表现为这样一个货币额，而不表现为另外一个货币额”^③。供给和需求状况的偶然变化确实会改变价格，但不能构成价格的基础。生产的社会化使得社会只能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水平来支付任何一种商品的生产，在没有其他情况改变供求时，商品在不同的时期也会以不同的市场价格出售。“即使没有由外界情况引起的供给或需求的变化，供求比例仍然可以由于商品市场价值的变化而变化……不论市场价值如何，供求必须平衡，才能得出市场价值。这就是说，供求比例并不说明市场价值，而是相反，市场价值说明供求的变动。”^④ 市场价值并不由供求生成，反而是决定供求变化的内在隐性因素。供求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而是市场交易存在的普遍现象，是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体现出的等价交换原则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对效用价值论、“三位一体”公式和供需决定价格论的批判表明，政治经济学研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被现象本身所蒙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揭示社会经济的运行规律，而不是对经济现象进行归纳总结。如果一种理论只是在现象层面进行肤浅的抽象，那么这种理论就不能称之为科学。马克思并没有全盘否定效用价值论和供求理论，反而还认可这些理论所描述的现象真实存在，他着重批判的是将现象描述直接当作本质规定的错误。效用价值论的支持者并没有解释效用原则如何随历史改变而改变，供求决定价格理论的支持者也没有解释究竟是什么在决定供求，他们把被生成的现象看作生成一切经济活动的源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生产关系的深入剖析。

三、片面的方法：超越历史的、静态的“假设-演绎法”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假设-演绎法”，庸俗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科学的哲学方法》一文中系统详细地阐述了这种方法。穆勒指认演绎法是政治经济学这样的“道德科学”唯一合理的研究方法，因为：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决定了这门学科天然排斥实验方法，只能使用思辨方法来进行研究；另一方面，经济活动具体场合的复杂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3页。

决定了人们不可能获得完全的经验，必须首先抽象出某种在一切场合都起作用的一般性原则，因而政治经济学研究天然排斥归纳法，归纳法只能作为演绎法的补充。演绎法需要一个假设作为起点，这个公理性的假设就是“人性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对片面强调假设-演绎法的错误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

第一，假设-演绎法片面地拒斥了归纳法。恩格斯指出，“归纳和演绎，正如综合和分析一样，必然是相互关联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片面地捧到天上去”^①。要正确地运用归纳法和演绎法，就必须懂得辩证思维，不能机械地制造演绎法和归纳法之间的对立。最初的经济学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归纳法，例如供求规律和各种经济范畴的抽象就是人们从现实的经济现象中归纳出的结论。早期的重商主义学说看到了金银对国家财富积累的重要作用，看到了各国发家致富的历史，因而把金银看作财富的唯一形式，主张商业资本家借助国家力量实现资本原始积累。事实上，16世纪以来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线的开辟，欧洲的国际贸易扩展到世界各地，商业资本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引起金银货币需求的持续增长；同时，欧洲民族国家的扩张也需要大量的金银货币开支，重商主义学说正是商业资本家开拓市场进行资本积累，以及民族国家应付庞大的政府开支，对金银货币提出强烈需求的直接反映。重商主义学说尽管不够科学，但仍然从实践层面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概念与范畴。人们无法通过归纳法得到科学的结论，但对于经验事实的发掘、归类和总结，是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步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具体的经验材料一定是研究的起点。穆勒所说的“人性原则”也恰恰是一种具有经验性、归纳性的结果，如果不依靠归纳法处理具体的经验材料，就不可能展开研究。归纳总结和演绎推理是两种最基本的思维模式，马克思恩格斯大量运用这两种方法。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阅读、引用了大量英国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从中发现了工人遭遇的悲惨境地，并归纳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典型方法，包括改变工资形式、延长工作日等，这些结论源于对现实材料的掌握和分析，而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性的分析则是演绎推理的结果。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由于过度重视演绎法而忽视对现实材料的归纳总结，导致结论同现实情形相距甚远，目前西方经济学界所批判的“黑板经济学”正是如此。在具体研究中，演绎法和归纳法不能偏废，应根据实际情况加以综合使用。

第二，假设-演绎法的前提缺乏历史性。穆勒认为，政治经济学全部理论起点应该是一个公理性的假设即人性假设，然而人类本性非常复杂，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关注人们追求财富的动机而产生的经济活动，只从人性中抽出一种法则即对财富的欲望作为演绎的起点。在马克思看来，这个人性假设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想象，其本身缺乏历史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②经济活动是人的社会性活动，个人确实是经济活动的起点，但个人不是一个没有任何社会性、历史性规定的孤立个体。在原始公社时期，个体不从属于整体就不能生存；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才脱离氏族的、家庭的关系，好像表现为孤立的、仿佛不受任何社会关系约束的个体，“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③。孤立的个人本质上是一个历史范畴，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这个历史范畴当作一般范畴固定下来，试图从孤立个人的人性演绎来建立起一般人类规律。由此，“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做社会一般的颠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页。

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①。鲁滨逊式的个体叙述默认了财产私有权的存在，但是私有权本身并不是永恒的范畴，原始公社时期的所有制是原始公有制，那时人类的发展还不允许存在私有制。穆勒也发觉了斯密、李嘉图采用这个前提的错误，他假设存在一种没有任何历史条件的情形，即一群殖民者来到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地区开始建立社会，要求人们在这种假设下通过演绎方法来讨论何种制度和政体是最恰当的。这一典型的思想实验体现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超历史性特征，既然不可能在人类社会中直接抹去现存社会的一切历史前提，那么这种思想实验也就不具有任何现实性。尽管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使穆勒比斯密和李嘉图前进了一小步，但穆勒仍然将经济制度等特殊范畴的讨论仅仅置于纯粹逻辑思辨之上，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这些范畴的历史性，究其根源，是由于其根深蒂固的错误的认识论所决定的。经济活动是人类的社会性、历史性的活动，不可能从超历史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缺乏历史性基础的假设-演绎法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缺乏科学性。

第三，假设-演绎法缺乏动态解释的能力。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是将社会看作时刻处于变动过程的有机体，从动态的视角来解释社会变革，而假设-演绎法则要求作为起点的公理假设必须是静态的、不变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等以演绎法为主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本质上发展出的是一套静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他们的目的只在于解释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于这个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并不关心。关于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变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要么认为这属于政治学的研究内容而不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要么在社会变迁能够促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方面予以笼统解释，要么干脆根本否认制度变迁的可能性，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是符合人类本性的最优经济制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反而是主张历史归纳法的德国历史学派比主张演绎法的政治经济学家更注重从动态的角度解释社会的演进，提出了一些关于民族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假设-演绎法要求理论范畴必须具有一般性，而且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总能保持稳定和前后一致，因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实质上都属于静止的范畴。在马克思看来，要解释不同社会形态的根本差别必须研究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特殊的变动，解释特殊的变动需要依赖特殊的范畴，这些范畴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一直处于运动状态的。可见，实际上只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规律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试图将特殊的、历史的规律说成是普遍的、超历史的规律，这就意味着否认了社会历史不断发生变迁的必然性，静止的理论缺乏解释社会在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变化动力的能力。政治经济学不能从孤立的、静止的一般范畴开始演绎，而必须以动态的视角看待经济社会的变迁，研究不同社会形态的特殊性，并对于这种特殊性进行深入的探究。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使用的假设-演绎法的批判说明，方法论的错误将导致不可避免的理论错误。马克思在谈到《资本论》的方法时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②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辩证方法兼具历史性和动态性，在具体的研究中大量采用了归纳法和演绎法，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假设-演绎方法有着本质区别。现代西方经济学在继承假设-演绎方法时，仍未真正地将现实社会经济运动纳入其中，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缺乏历史性和动态性的固有缺陷。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22页。

四、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价值

在完成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三个维度全面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旗帜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经济危机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揭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根本对立的制度根源，预示了由更高社会形态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创立了革命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立场、观点、方法三维架构的辩证统一，无产阶级立场是基石，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等观点是核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主线。它的确立，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实现了阶级性、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高度统一，成为人类反抗剥削、追求经济解放的斗争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错误中形成和发展，它具有与生俱来的斗争性，《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清楚地表达出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自觉传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斗争精神，立足于中国实践，与形形色色的歪理邪说作坚决斗争，抵制住了西方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干扰，在斗争批判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人秉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提出了本土化的经济学原理，逐步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观大势、谋全局，沉着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成功驾驭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要学习好、运用好、发展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界提出了新的时代化要求。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三维批判，就是要学会在斗争中成长、在批判中升华，提升辨识真真假假的能力，从立场、观点、方法三个维度出发，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人们观察、认识、处理问题所处的立场，从根本上来讲是由人们的经济政治社会利益和地位决定的。习近平指出：“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理论，人民利益应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价值旨归，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只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西方庸俗政治经济学。如果片面地强调一部分经济主体的利益，就会导致贫富分化、产生阶级矛盾，就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政治经济学的人民立场必须以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支撑，否则，政治经济学就会退化为纯粹道义的批判。恩格斯指出：“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② 没有科学理论的支撑，即便持有正确的理论立场也无法行之有效地指导实践，作出的批判相应也缺乏足够的学术价值。在经济政策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必须明确改革是为全体人民利益而非个别的行业或群体服务，否则理解政策就会陷于片面。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后，还要从经济理论的层面分析经济政策或体制改革对生产过程的变革性意义，为政策评价提供科学依据。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一方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经济

① 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学理论的资产阶级立场，认识到理论中隐藏的价值判断与非科学偏见，不能将其视为“价值中立”的所谓“纯科学”，应认识到数理模型的抽象过程对于经济社会现实矛盾的遮蔽；另一方面，要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理论也存在不少关于经济运行机制的客观分析，不能因为西方经济学理论带有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色彩而完全拒之门外。

其次，要大胆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不断透过经济表象总结客观经济规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如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绝不能滑向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方向；必须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髓的认识，提高对效用价值论、“三位一体”分配论等观点的鉴别水平，在批判错误观点过程中持续地推陈出新、循道而行。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性，现实经济运行环境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更加错综复杂。理论研究不能止于经济运行现象的描述，要借助“抽象力”，特别要注重研究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还不存在的新范畴、新现象，例如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等，尝试从中总结出中国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律。当前学术界基于劳动价值论对多部类模型的拓展和对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深入分析就是具有一定学术意义的新尝试。对于新发展理念的研究，不能停留于对新发展理念政策层面的归纳，要从经济运行规律的高度深入剖析新发展理念的深刻内涵。新发展理念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次重大调整，代表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都会产生新变化。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应深刻领会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透过政策变化表象研究背后的规律实质，更加透彻地把握新发展理念对经济结构根本性调整的要求，提出更多具有实践意义的政策建议。

最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义方法论，对静态、片面的“假设-演绎法”的变种形式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和辨识能力，在批判西方庸俗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过程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精髓的认识，立足于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研究，把握其发展规律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全面掌握中国社会经济运行经验材料，综合运用个案研究法和统计方法以归纳总结经济社会运行中存在的现象、问题与经验，并运用理论进行充分的演绎推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当具有历史性和动态性，注重范畴在历史上的变化，注重解释社会的演进过程，注重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革命建设实践中的伟大成就，实现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现代化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中国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经历了长期的探索，自清末民初，中国学者就对现代化问题有过大量的探讨与争论。在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时，应具有历史的眼光，认识到中国社会关于现代化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并非与西方语境下的现代化含义完全一致，而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这种变化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紧密相连，有着复杂的历史逻辑。如果对这一历史进程不加考虑，就无法全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的讨论，应该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深入剖析上，应当体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否则就会重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犯的缺乏历史性、缺失动态性的错误，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律。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①。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2021年，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非凡力量和世界意义，这一变革蕴含着丰富的研究素材和巨大的研究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拥有前所未有的拓展空间。只有坚决批判西方庸俗政治经济学错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敢于善于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才能不落于西方庸俗政治经济学的陷阱，才能从经济运行规律的高度紧紧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从发展道路的高度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实践不断提炼总结。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传承中保持高昂的斗争精神，坚决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邪路，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才能为人类社会提供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五、结 语

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剖析与深刻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三个关键维度。必须认清理论背后的阶级立场，不能把政治经济学当成“价值中立”的“纯科学”，早期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庸俗政治经济学，其首要和共同的特点就是资产阶级属性，是资产阶级利益诉求的集中反映。政治经济学研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效用价值论、“三位一体”公式和供需决定价格论，错误地将现象描述当作本质规定，忽略了生产关系研究，不能揭示社会经济的运行规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采用片面的假设-演绎法，从孤立、静止的一般范畴出发，不具有动态解释的能力，方法论的错误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理论的错误。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三维批判，就是要警惕和抵制西方庸俗政治经济学错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敢于善于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落入西方庸俗政治经济学的陷阱。发展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规律。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
- [2] [苏联] 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翟松年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
- [3] 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 [4] 程恩富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 [5] 张雷声主编：《新编经济思想史》第4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
- [6] [美]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 [7] 胡乐明：《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8期。
- [8] 张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缘起及其发展逻辑》，《哲学研究》2021年第6期。

(编辑：黄华德)

^① 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